

“农民解放”问题及其十七年农村小说讲述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 湖南怀化, 418008)

摘要: 20世纪早期诸多文献中关于农民“解放”比较具体的设想, 其实在1949年以后的人民国家里已经得到了全面实现。但是, 依据“解放”一词更为复杂和深入的含义, 并不应该认为1949年以后农民的全部日常生活, 已经天然地完成了解放状态。1949—1966年的农村小说或许保留了解放实践更加鲜活的矛盾、想象和场景。如果借用不同主体间性关系的视野, 当年的红色经典可能会有更多复杂的“声部”会被呈现出来, 虽然它们原本都是高度整体性叙述的。尽管这样去做实际上面临着多种艰难, 但是这一话题在文学上的严肃性仍然存在。

关键词: 农民解放; 十七年文学; 农民小说; 社会主义; “解放”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160-05

一些晚清时代流传下来的老照片, 以影像方式记录了中国农民的极端贫困与精神“蒙昧”: 他们的衣衫褴褛百结, 他们眼神充满着与动物相差不多的混沌与呆滞——这些相片留给我们的印象几乎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由于基本都是当时外国人拍摄的, 它们可能源自西方殖民者隐含的东方主义, 及茅盾《关于乡土文学》中所说的“具有游历家眼光的作者”的混杂视角。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 在这些影像之外, 中国农民的问题的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期晏阳初曾称, “中国的民族, 人数有四万万, 在农村生活的, 要占到80%”, 这就是“为数在三万万以上”的农民。^{[1](476-477)}这“三万万以上”的中国农民生活之悲惨, 在当时恐怕也是世所罕见。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列举了中国农民要忍受地主的高额地租, 外国资本家的洋货输入, 军阀们的连年兵祸, 以及贪官劣绅们在国家征收的正项钱粮之外, “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等苛重的盘剥。^{[2](2-3)}据王亚南的《中国地租总论》(1943), 中国农民一般的租额“总要占土地生产物百分之五左右”, 而中国的平均地租率约为十一年(土地的总价格除以土地年租额), 其租率之高远非“现代任何国家所可比拟”“高到无可比拟”。^{[3](660)}中国农民的种种悲

惨处境使得农民、解放(“翻身”)、革命等话题联结在了一起。如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疾呼, 我国是一个农国, “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 如果他们得不到解放, 我们国民全体也不可能得到解放。^{[4](93)}1927年“亦生”的文章《论农民的解放》也认为, “农民的解放”是“很重要、而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农民问题正确的解决, “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5](315-317)}并且他认为:

农民解放的要求是些什么? 这虽然是各省、区有个大小的区别, 然而在整个的日趋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 农民的积极的要求不外是下面这几种:

一, 在经济上要求减轻租谷, 减轻利息, 及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二, 在政治上要求乡村的地方自治, 反对一班万恶的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 鱼肉百姓;

三, 再进一步使农业生产的方法进步, 生产力增高。(亦生:《论农民的解放》)

沿着上述农民悲惨处境的提问逻辑, 浮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翻身”(解放)问题, 这在民主革命年代曾经被简洁地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 以及表现为1920年代后期直到1950年代初中共的各种土地法令。然而, 上述亦生对于“解放”的理解显然具有历史的时间性。以“十七年”为例, 其时农民“解放”在亦生那里的想象事实上已经实现: 不仅再无地租和利息剥削, 土地也以单干、互助组、合作社或者人民公社等形式归属于农民, 旧式地主、士绅在

收稿日期: 2013-02-15; 修回日期: 2013-05-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10C1069)

作者简介: 王再兴(1968-), 男, 湖北鄂州人, 文学博士, 湖南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乡村的统治已经被新型的国家基层政权所代替，而且各种新作物品种和新耕作方法确实也都在实验当中。然而，至此中国农民是否就获得了最终的“解放”呢？问题恐怕并不这样简单。显然，这涉及到对“解放”做何理解的问题。如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中，“解放”一词使用的是 liberation(“解放、释放”)，它的原词 liberate 在意思上更多地暗含了解放所意味的自由状态，即 liberty(“自由”)。但困难在于，阿伦特依然认为“解放”并不直接意味着“自由”，她的一段人所熟知的话是：“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negative)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动机也不能与对自由的渴望等而视之。”^{[6](18)}这样看来，阿伦特这里的“解放”倒是有些像上述亦生等人对于“解放”的理解了，而自由的渴望，则更超出狭义“解放”的意义之上。

同样不奇怪的是，按照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的理解，今天这样一个当地—全球的现代性语境下，个体或群体处境的解放其实是与反思性精神联结在一起的，正是在这种反思性的穿刺之下，他提到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概念。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认为它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体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法性统治。他反复表明：“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7](247-249)}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理解，所以在吉登斯那里，解放政治中的“解放”被提及原文是 emancipatory(“解放的”)，显然它的原词是 emancipate(“释放、解放”)，它意味着“使……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简言之，在阿伦特和吉登斯等人那里，“解放”并不只是简单地等同于暴力革命(“翻身”)的胜利，它的真正意义是指向人的对自由之境的渴望。这一渴望遭遇到了“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等三大敌人：这三大敌人只有第一个，即“剥削”，才是通常被讲述成历史的和革命(翻身)的；而第二个和第三个敌人则更有可能是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精神的，它们仍然会以隐蔽的姿态存在于革命之后的状态之中。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新的逻辑上，农民“解放”的意义超出了上述亦生等人对于解放的朴素理解，从而重新成为今天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而当年社会主义的农村小说(1949—1966)，或许就保留了解放实践更多鲜活的想象和场景。

二

由于当时人民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以及“舆论一律”的文化体制，今天我们去追溯这些“解放”想象的出现及其互文关系的契机，其实面临着各种艰难。寻常被被誉为“史诗性”的文学讲述，或许早已潜藏了被隐密地偏至选择过的痕迹，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的真正事实更有可能隐藏在文学文本以外的材料当中。像高王凌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一书，试图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研究，讨论那个时期农民的怠工、压产、偷拿、瞒产私分、包产到户等“反行为”。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序言里说到有一些文学作品已经反映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的那些“猫腻”，并举了五个例子；但也许作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五个讲述的例子全部出现于1980年代以后，而不是当年此类行为出现的历史时刻。书的序言中并称：“也有朋友向我问起农民这些行为在法律法令上的地位，这时我才发现，这在有关的资料中竟是查不到的。……好像这些现象就不曾存在似的。”^{[8](1-4)}这里提示了当年农民的真实世界与文学表现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它也意味着，关于当时农民的生活可能有两条反差极大的呈现路线：一条是通常高昂而令人鼓舞的文学性讲述，另一条则是这些讲述背后隐蔽乃至抗拒的“沉默”。而我们所要寻求的阐释，正是处在这些讲述与“沉默”的互文关系之中。然而，上述“沉默”背后的诸多事实，由于当年的敏感性，或许不太可能通过当时媒体议程设置的过滤，从而也就无法被更多的人“看见”。不仅如此，媒体甚至出现特殊的新闻制作过程(如“摆拍”)，这自然又进一步引发了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对于当年某些报道材料用作文学背景的真实性的狐疑。由此，寻找另一类农民历史的事实或表述，以使“解放”的话题重新被置于繁密、真切的互文关系之中，实属相当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一类材料能否被我们发现并且理解，可能还需要超越我们自身的某些个人经验。20世纪早期鲁迅因为“哀其不幸”的隐痛，曾将中国农民升格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另一面，读者的印象也更多地被指向了农民深苦和悲凉的一面，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强烈的批判性，也导致了农民穷困中的日常生活内容，即所谓“生活方式”的有机部分，也渐而被人淡忘了。人民国家建立后，自1950年代初对《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批判以来，“日常生活”

通过文本中情节的辩论方式(蔡翔语)被证明失去了合法性,此后在总体意义上就被逐出了文学正面表现的领域。问题当然不是说农民的生活不是艰辛的,而是说,农民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并不依赖于“被表述”(即所谓“代言”)而存在,也不局限于后者的呈现内容。事实上,“生活方式”不仅是农民作为社会阶层的身分表征,而且更隐含了农民作为社会群体的自我同一性,他们也是“主体”,尽管是文字语言匮乏、表达方式破碎甚至沉默的主体。根据吉登斯的说法,“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的关怀,预示了未来一种影响深远的变迁”,^{[7](252)}它正是“解放政治”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可见,对于如何阐释农民的“解放”,一方面我们需要从自身狭窄的经验中逃逸出来,另一方面,这种转述或者“代言”无论出于怎样的诚恳,又几乎必然会引发其他相关的问题。虽然在柯文的《历史三调》中,个人经验正是构成“历史”的要素之一,但它们之间如何进行统合,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雷蒙德·威廉斯从“经验”概念进而提出的“感觉的结构”的说法,曾经指称了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享的那种感知是何等重要,同时又是如何难以被圈外人轻易获得,“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时,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到的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把特殊活动结合成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我建议用以描述它的术语是感觉的结构”。^{[9](130-132)}这似乎可以看作前述困难的一个佐证。

即便是如此,无论作为想象者的作家,还是作为阅读者的我们,“感知”也是时常难以被轻易信赖的。一些论者从当年社会主义农民小说的分析中,提出了诸多的文本裂隙,从中可见一端。如有人提到,作为“并喻文化”(指一种横向面向同时代人的学习创新的文化)代表者之一的梁生宝的行为,也带来了新的“前喻文化”(一种面向先辈的全盘纵向守成的文化)的危险,形成了一支愚顽的“跟跟”队伍;并提到了梁生宝塑造中,不自觉地作者笔下躲过理性审查、时不时迸发出的“面对文化的自卑和由此而来的偏斜”:外表强调梁生宝忙,实则是因为他对徐改霞“有文化”心存疑惧,终于导致梁徐爱情的悲剧。^[10]而在实际上,柳青当年是打算把梁生宝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他曾直言:“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11](284)}这样看来,柳青自己的“感知”似乎也不太能够让人完全信赖。也有人将《三里湾》中的主任委员范登高、《山乡巨变》中的乡支书兼农会主席李月辉、《创业史》中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艳阳天》中的

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等作为代表,称他们在较早的战争年代或者土改时期都曾经积极拥护并执行了革命者的各种路线和政策,身先士卒且成为广大底层农民的带头人,“是革命意识形态之下的农民阶级的先进者”。然而到了合作化时期,这些人却转而迷恋于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对主流意识形态宣谕的合作化变得越来越隔膜了起来。^[12]这其中包含的问题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会选择并传唤新的革命主体”,这意味着在历时背景下,其实同样具有劳动者属性和私有者属性这一“农民阶级两重性”的王玉生、梁生宝、萧长春等新型农民主体,将会一样地面临着“形象的焦虑”。这种焦虑催促这一组主体更加革命,以至发展到最后只可能产生一个近乎完美光辉的高大全形象。这实在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它意味着正是原先的那种“革命”的激情,却带来了“继续革命”的困境,反而形成了某种压抑。也就是,对于阐释农民的“解放”来说,在历史材料的寻觅和感知“经验”的重要之外,其浑然不觉的观察、思索、和呈现中的后设主体性,亦有可能使前两者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但是,话题在文学上的严肃性仍然存在:如果失去真切性为基础,那些农民形象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正的“审美”意义呢?虽然这是我们共同的困境,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审美”化冲动的出发点和最后目的,原是指向促进我们的现实生存的。这种隐喻着政治的宿命所提出来的反思性要求,将引领着我们前行。它可能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延纳历史化的考察方法,去回溯中国农民的身份历史及其相关的多重互文关系——或者这是较好的回应方式之一。

三

张旭东先生曾对“当代性”有过非常精彩的讨论,将其作为逃离外表强大的刻板“历史”和“知识”的路径(《在“当代性与文学史”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由此,如果我们能够脱出这些刻板的印象,使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述展示出它们自身的复调,文本原先所试图传达的整体性主题就会出现分裂,并重新上升为“问题”——或许,这是对“舆论一律”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小说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条件,虽然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也意味着相关的探索将会自然地转到各方主体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解放”想象上面。也正是因为这样,“十七年”关于农民和乡村的社会主义叙事将在现代性的层面,不独可能为农民自身的解放与

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赢得有力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可能使得农村叙事与当下的城市叙事在题材意义上价值相等，并且走向独立而阔大的讨论/表现空间。当然，这一研讨其实面临着李杨所说的“化神奇为腐朽”的危险：它将从何开始，如何开始？又最终走向何处，如何走去？综合考虑，窃以为延用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或许是可供考虑的选择之一。

(1) 以“故事”作为场域的方式。从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的寓言、神话，到南北朝时期的“志怪”、“轶事”，到唐宋传奇(文言小说)、宋元话本，到明清章回小说与传奇(戏曲)，再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故事”与“情节”因素，“故事”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情感与智慧。也因此，“故事”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场域。这也是本文选择以十七年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叙事作为讨论对象的理由。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说，“由涕泪飘零到嘻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比起历史或政治论述里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并称“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像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13](1-2)}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说：“其实重新讲述这段小说史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真实地了解我们的过去。”^{[14](21)}

(2) 将“叙述”区分为不同层次。齐泽克的《幻想的瘟疫》开篇即说：“潜意识就在外面，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当我们分析幻想是如何同意识形态结构的内在冲突联系起来时，如果像这样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性的外表上，往往能取得丰硕的成果。”^{[15](1)}本文也赞同从齐泽克所称的“物质性外表”——对于故事来说，它指的是“讲述”——来切入，即在讨论中借鉴某些历史性材料而使原先的叙述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就像里蒙·凯南在她的《叙事虚构作品》中将文本内容区分为“故事”和“本文”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叙述”在十七年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中将呈现出分裂与混杂的面貌，成为不同主体的想象之间进行意义争夺的场域。“讲述”的这种特质，使它在“重述历史”中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敏锐地指出：“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去政治化’往往需要首先从‘去历史化’开始。”^{[16](19)}董之林也称：“实际上，今天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正由于对历史相关性的片面理解造成的。”^{[14](300)}正是在讲述的暧昧之处，不同的主体意识在彼此冲撞或者克服，它将成为我们考察不同想

象的窗口。

(3) 作为矛盾闭合点的“叙述”。历史总是连贯的，真正的对于历史的阐释所以是“旧”和“新”的彼此熔铸。但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历史同样是一种叙述，一种诗学方式的“神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如何弥合？齐泽克直接指陈：“叙述之所以会出现，其目的就是在时间顺序中重新安排冲突的条件，从而消除根本矛盾冲突。……叙述悄悄把它意在再生产出的东西预设为业已存在之物。”^{[15](12)}齐泽克对“叙述”的批评，正可以反证福斯特所谓“一本结构严密的小说，往往许多事情是错综复杂、互相呼应的”虚构自信(《小说面面观》)。同样是在齐泽克的《幻想的瘟疫》中，作者还指示了“幻想”(“想象”)影响受众的方式，即以图示化的方式打动接受者的情绪，并令人毫不觉察地进入接受者的潜意识，使其像接受自己的思想一样悦受。这也是十七年时期，文学代替性、爱情乃至战争而生产着“激情”的原因。此外，它也是延安文学及十七年文学中许多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集体庆典/仪式的意识形态功用，一种规训的中介和路径。

(4) 历史编纂学事实的“真实”观。^{[17](177-181)}“真实”在1933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中国时，仍然是其经典定义中的主要内容。这种“真实”/“不真实”的视角一直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存在，但所谓“真实”的胜利往往依靠的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力量，而是依靠主流意识形态将异质性表达逼入沉默的深渊所致。直到新时期之初，关于“真实”的争论又重新出现了，在对后三十年农村小说的批评中也重复地听到同样的声音。从这个总体过程来看，“真实性”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或“现实主义”等诸多概念的焦点问题。然而，这个概念仍然是歧义纷出的，董之林著作中有一段话描述了这个“真实性”原则在十七年中的纠结，相当有针对性：

回顾文革前十七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文字颇多，不过，对这种创作方法规定性的种种解释，不论为“现实主义”加上怎样的前缀，却始终围绕着一个如实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原则。至于文学创作方法是否只有这一个原则，而且这种现实主义强调的“现实”究竟是“日常生活”的真实，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实，或者是“本质”的真实，大家的理解并不一样。但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少有人直接质疑阐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一直缺乏穷根究底的追问，人们对原则的理解实际上各执一词，这就使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能下简单断义。^{[14](305)}

正是因为这个困难的问题,蔡翔和董之林的著作不约而同地追溯到了“想象”这一语词。

(5)“永远历史化”。文学或历史自有其生命——它是某种关于知识的起源、发生、衍变、转移的自在时间与方式。文学本文作为时间与世界的“流传物”,伽达默尔表示,“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我们宁可认为,对流传物的理解并不把流传的本文理解为某个‘你’的生命表现,而是理解为某种脱离有意见的人、‘我’和‘你’的一切束缚的意义内容”。^{[18](460)} 我们有过太多的教训,当时的偏至诠释都在历史的后续时间里被重新还原回去,回到历史现场的“原点”,去再次凝视历史的细节和联络,如文学五四、学衡派、左翼运动、七月派和九叶派、胡风、沈从文和张爱玲,等等都是如此。显然,我们需要在过往的缺失与想象的正义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历史关联,套用蔡翔先生的逻辑来说,就是“要再政治化,先从再历史化开始”。正是在这个去历史化/再历史化的差异中,可能隐伏着勾连起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最为有力的某种知识路径。诚然,这种回返并不容易达到,困难还同时来自于我们自身思维的成规。

参考文献:

- [1] 晏阳初. 农村运动的使命[C]//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上册).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 [2]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C]//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 [3] 王亚南. 中国地租总论[C]//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 [4] 李大钊. 青年与农村[C]//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一辑).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 [5] 亦生. 论农民的解放[C]//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上册).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 [6] [美]汉娜·阿伦特. 论革命[M]. 陈周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7]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 赵旭东, 方文,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8] 高王凌. 序言[A].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 [9] 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分析[C]//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10] 王国民. “十七年”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思考[J]. 教学与管理, 2006(27): 95-96.
- [11] 柳青. 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C]//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 [12] 王永春. 动力抑或对象——从农民的两重性看“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焦虑现象[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1): 147-149.
- [13] 王德威. 序·小说中国[C]//想像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4] 董之林. 旧梦新知: “十七年”小说论稿[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 幻想的瘟疫[M]. 胡雨潭, 叶肖,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6] 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7] 陈新. 西方历史叙述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8] [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Farmers' "Liberation": the Problem and Its literary narration (1949—1966)

WANG Zaix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China)

Abstract: Many literal imaginations about farmers' "liber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had already got its realization after 1949. But,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towards "liberation", we couldn't assume it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the whole farmers' ordinary life after 1949 was naturally placed in the completion of liberation. Reviewing the history, those socialist rural fictions in 1949—1966, probably reserved more vivid confliction, imagination and scenes concerning the liberation practice. Therefore, in the viewing of inter-subjectivity, those red masterpieces in the early years showed more intricate "voice parts", although they were originally in a single tone. While it may meet various difficulties to do that today,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topic for the literature still exists.

Key Words: farmers' "liberation"; literature from 1949 to 1966; rural fiction; socialism; imagination of liberation; narration; predicaments

[编辑: 胡兴华]